

延迟退休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杨良初¹ 李桂平² 卢娜娜²

(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2.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在老龄化日益严峻和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社会发展现状下,为确保社会保障政策的可持续,延迟退休政策应运提出。国内外诸多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与政策匹配、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增长、青年就业挤出等方面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社会效果提出了双向论证。北欧、日韩等国家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保障退休人口的二次就业、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法规等方式渐进式推进延迟退休政策。通过对我国退休政策的梳理发现,从社会政策发展方面看,政策环境、政策依据、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结构、人口结构、行业阶层与延迟退休政策的施行存在现实矛盾;从劳动者个体角度来看,易出现身体劳损、利益受损、获得感剥夺等问题。必须加强引导,通过科学论证和人文情理兼顾推动政策“合法化”过程,增进共识,促进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协同,方能达成社会政策目标。

关键词:延迟退休 就业挤压 社会政策 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10-0072-08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21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主要基于4个方面的考虑,即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

“延迟退休年龄”这一话题由来已久,政府、媒体、学界等均有开展相应调研,受调查对象反对比例非常高(见表1),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但也有学者指出因受限于调查渠道的群体偏差性,如网络技术、新媒体应用、用户受众等限制,网络调查并不能普遍代表群体样本性,容易造成总体参数的估计误差^[1]。在网络民意调研的反馈影响下,人社部将延迟退休政策暂缓施行,主要在学术界进行研究讨论。

[收稿日期]2021-05-27

[作者简介]杨良初,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财政问题等;李桂平,管理学博士,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等;卢娜娜,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再动员及社会政策研究”(19BSH107)的部分研究成果。

表 1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网络调查情况表

时间	主办方	调研主题	样本量	结果显示
2012 年 6 月	人民网	人社部拟适时建议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咋看?	227.6 万人	反对的比例高达 96.7%
2013 年 8 月	中国青年报 社会调查中心	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	25311 人	94.5%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 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2015 年 两会期间	大粤网	渐进式延迟退休民意大调查	869 人	95.74%的受访者不支持
2016 年 3 月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搜狐民调	相关调查	169063 人	91.1%的受访者不愿意延迟退休

学术界对于“延迟退休年龄”这一主题涉及范围较为广泛,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社会保障等学科领域研究较多,主要从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形成支持和反对政策推行的双向研究结论。从养老保险金的支付方面,有学者通过对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供给方面研究,认为存在资金缺口,应该施行延迟退休政策以缓解养老金压力^[2-5]。从政策时代更替性方面研究提出延迟退休政策施行的合理性^[6-7]。从社会性别和公共政策公平性方面研究,延迟退休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效应更为凸显^[8-9],同时延迟退休对于就业有着“正向促进”功能^[10-11],能有效延迟高缴费率的到来^[12]。从生命发展周期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对于财政收入波动等方面有较好稳定作用,同时降低社会劳动力缴纳税费负担,从而降低失业情况^[13-14]。反对延迟退休一方认为,从就业岗位影响来看,有学者研究指出老年群体离开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改善年轻劳动力的就业情况^[15-18],延迟退休对于年轻一代有“就业挤压”效应。从养老金缓解情况来看,有学者基于多种研究模型,提出延迟养老并不能长期缓解养老金缴费压力,同时因养老金缴纳基数较低,反而影响其长期的可持续性,也将导致个人养老金财富的相对缩水,导致个人养老财富受损^[19-21]。从退休福利政策享受方面,延迟退休使得本应进入退休期的群体福利受损,尤其是因产业结构转型而福利待遇较差的一线劳动者和身体条件不适宜延长劳动期的体力劳动者。相较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和管理层级,一线体力劳动者相应的养老保障金的享受年限也相应

减少,从而产生群体性福利差异^[22-23]。

以上研究已就延迟退休年龄的相关要素和影响进行充分论证,较为全面地从劳动力供给、就业岗位、社会福利、社会性别、公共政策、个体获得等方面对延迟退休的相关争议进行论述,在数据选取中应用 CHARLS 数据库、CHIP 数据及国内外调研数据等进行科学分析,并采用了 OLS、Logit 和 Probit 模型、指标变量 delay_type、delay_yes、养老金财富模型、动态模型、生命周期理论、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等多种理论模型进行研究论证,从多元素、多角度进行学术探讨和实证研究,但依旧缺乏较为全面的问题对比分析及政策建议。本文将综合诸多研究论证,对国内外各地区延迟退休政策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同时,分析延迟退休政策存在的现实问题及风险挑战,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意见。

二、国外延迟退休政策分析

世界各国因经济发展、人口构成、社会文化的差异,其社会政策呈现区域性差异,但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共同面对的全局性问题。各国因产业结构、劳动力状况、社会福利等情况不同,采取各具特色的退休政策。与有代表性的北欧五国、日本、韩国等进行政策对比分析,有助于为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思路和借鉴措施。

(一)北欧五国延迟退休政策分析

北欧五国,包括冰岛、挪威、瑞典、丹麦、芬兰五个北欧理事国主权国家,因独具代表性的福利型社

会保障政策而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其高福利社会政策背后也面临着高税收和政府较高程度干预的现实问题。其人口结构呈现低生育率和高度老龄化特征,同时老年就业率较高。北欧五国的退休政策体现出以下特点:

1. 退休年龄呈现增长趋势。冰岛养老金领取的年龄要求是 67 岁,瑞典在 2003 年开始施行新的养老政策中规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 65 岁,挪威在 1988 年达成的工会联盟和企业联盟协议中规定,就业者 67 岁可以领取养老金,在 2011 年开始施行 62 岁-75 岁之间可灵活退休的新法案。丹麦实施“逐渐温和式”退休政策,根据时间进程逐渐将老年退休时间延至 65 岁-67 岁。芬兰于 2005 年出台新的退休政策,将退休年龄由 60 岁提升至 63 岁-68 岁之间。由此可见,北欧五国近年来的退休年龄政策都逐渐倾向增长趋势,均高于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作为福利型国家代表,其社会政策走向也反映出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发展之间的协同趋势,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2. 养老金政策有鼓励老年人延迟退休的倾向。其中,冰岛立法取消了 75 岁必须强制退休的规定,丹麦于 2008 年取消了 70 岁强制退休政策。瑞典虽规定 67 岁为强制退休年龄,但退休后依旧可以与雇主协商继续雇佣。取消强制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于鼓励老年群体延迟退休,积极就业。同时,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退休的养老金的领取份额进行规定,直接刺激老年群体延迟退休继续就业。其中,冰岛将雇主缴纳养老金的比例从 6% 提升至 8%,老年就业者延长工作期将有助于获得更多的职业养老金。其养老金政策从取消强制退休年龄到提升养老金享受数额,均呈现鼓励老年就业者延迟退休的激励倾向。

3. 延迟退休政策更为弹性多样。弹性退休政策意在保障劳动者个人权益,同时反映国家指导意向,通过适用性区别引导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政策进行行为选择。其中,瑞典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但允许在 61 岁-70 岁之间退休,并根据退休年龄进行退休金不同配比,65 岁退休时按照 100% 领

取养老金,每提前 1 个月扣减 0.5% 养老金,对于推迟领取的人员每推迟 1 个月则可增发 0.7% 养老金。同样,挪威也运用类似政策鼓励老年人群延迟退休,工作年限越长,其退休金领取比例越高。芬兰采取累进制养老金收益率计算,18 岁为养老金起算年龄,53 岁之前养老金在工资中所占比例每年增加 1.5%,53-62 岁之间每年增加 1.9%,63 至 68 岁之间每年增加 4.5%,呈现出阶段性累积分布。在弹性退休年龄选择上,既能给予劳动者退休政策的选择自由,同时也通过养老金发放比例调控鼓励社会成员延迟退休。

(二)日韩两国退休政策分析

日本、韩国与我国同为亚洲地区国家,文化源流相近,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对早于我国,退休政策的发展改革历程和社会影响效果更具有现实参照性。两国虽然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似,但在退休政策改革,尤其是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呈现明显差异,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配套政策完善与否等成为延迟退休政策施行顺利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1. 延迟退休政策制度的阶段性改革。日韩两国在 20 世纪中期社会经济发展快速阶段就开始逐步建立完善本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推进国家、企业、个人养老退休配套制度发展。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进中,两国均对政策法规进行了阶段性修改。其中,日本从 1971 年出台《中老年雇用促进特别措施法》到后期多次修改《老龄雇用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 2013 年 4 月前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为 65 岁。韩国从 1991 年制定颁布《老龄雇用促进法》,后经多次修改,从保障老年人群就业权利到提高国民年金领取年龄,最后制定逐年阶段性不同年龄群体过渡的延迟退休政策,最终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提高到 65 岁。

2. 延迟退休政策的操作性差异。在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终身雇佣制的传统雇佣方式,日韩两国面临延迟退休政策颁布后,薪资的累进递增、养老金的缴纳以及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等不同因素影响,容易造成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

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此期间,日韩两国工会扮演了不同角色,日本工会最终妥协于政府政策和企业利益,限定了员工进入老龄期后的工资涨幅,从而使延迟退休政策得以实施。而韩国工会则因其成员构成、组织内部利益诉求不一等多重因素处于政策抗争状态。

3.延迟退休的配套政策差异。日本在修订相关延迟退休政策过程中,出台了相应配套政策。从缓解养老金财政压力方面,提高退休金领取年龄和缴费比例。同时,出台老年人群就业促进计划,对企业雇佣老年劳动者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为老年群体提供培训机会,创立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HRC),服务老年群体积极就业。而韩国因配套政策未能及时完善,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政策未能同步协调,从而影响了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施行。

通过以上不同国家的延迟退休政策施行情况可以看出,延迟退休政策已经成为应对老龄化人口结构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分步骤、阶段性调整政策制度,做好老年群体就业的相关系列保障服务。其中,政

府意愿、企业利益、劳动者权益等均需权衡协调,通过弹性化退休政策,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个体性差异。通过激励性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延迟退休,提升雇佣老年劳动力的意愿。以上国家的相关政策为我国实施延迟退休的方法步骤提供有益参照。

三、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退休政策的发展历程对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实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也反映出现行政策的时代性特征和历史性问题。我国现行退休制度经历多次修订,体现了政策的时代性特征,也为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实施提供了现实可能。

(一)我国退休政策梳理

建国以来,我国根据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制定一系列退休政策法规,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退休政策的时代递进性发展,退休年龄界限主要以职位类型、性别、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特殊工作岗位等进行划分,整体上实现社会平等的政策规范模式,为我国上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

表2 我国历年退休政策一览表

时间	政策法规	主要内容
1951年2月	《劳动保险条例》	正常退休的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
1955年12月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	国家机关中女性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从50岁提高至55岁,并加入对伤残提前退休的规定。
1957年11月	《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降低了最低工龄限制,取消延迟退休期间的养老补助费待遇。
1978年5月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工人退休、退职相关规定
1978年6月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干部退休相关规定
1983年9月	《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高级专家可延长退休年龄,不超过70岁
1983年9月	《国务院关于延长部分骨干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退休年龄的通知》	中小学骨干教师经申请审批,男性可延长至65岁,女性可延长至60岁退休。
1990年2月	《关于高级专家退(离)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女性高级专家可到60岁退(离)休
1992年9月	《关于县(处)级女干部退(离)休年龄问题的通知》	县(处)级女干部可到60岁退(离)休
1994年10月	《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破产国有企业员工安置问题
1997年3月	《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破产企业员工安置问题

政策依据。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兼顾现实发展情况,制定相应单位破产、改制后员工安置计划,总体上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平稳过渡。

(二)我国延迟退休面临的问题分析

从表2中可看出,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最初定于20世纪50年代,后经多次修改及补充,除对特殊行业或岗位进行规定外,退休年龄政策沿用至今。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情况较于上世纪有着较大差异,民营经济发展迅猛,社会业态逐渐多元,劳动力结构变化,诸多因素均成为影响退休政策的可视变量。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养老金压力,增加劳动力产出,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但如何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制定施行相关政策,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1.从社会政策发展上看,政策环境、政策依据、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1)政策环境方面,我国现有退休政策依据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存在政策依据和政策环境的差异性,进而导致原有政策的适应性差等问题。从社会舆论环境看,由于现今社会民众参与公共议题意愿强烈,延迟退休政策自提出以来,饱受社会各界争议,其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施行对于政府、企业、劳动者等均存在较大适应性考验,在现实生活中各方处于利益协调状态,存在利益冲突风险。

(2)政策依据方面,现今对于延迟退休的理论论证主要来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缓解养老金压力和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等,但从多维度论证中,延迟退休对缓解养老金压力的实效依旧难以获得学界的统一认可,同时因我国国情属于未富先老,且青壮年劳动力依旧供大于求,延迟退休反倒容易成为影响就业市场有序运行的不确定因素。

(3)政策制定方面,我国现有退休政策较为单一,配套政策不完善,且多是从特殊行业、岗位进

行退休年龄划分,缺少整体业态的历史统筹视角。延迟退休政策如果依据现有政策进行延续制定,不利于营造社会正义的政策氛围,且易激化社会不同行业阶层利益矛盾,出现政策利益偏好问题。

(4)政策实施方面,我国退休政策一般由人社部门执行实施,其主要利益牵涉退休金的界定和发放。延迟退休政策并不仅仅是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节点性计算的经济利益问题,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牵涉延迟退休的老年群体尤其是政策改革后的初代老年群体的就业权益保障、社会再就业等综合性问题,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路径向多元化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的实施提出更多现实挑战。

2.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结构、人口结构、行业阶层与延迟退休政策的施行存在现实矛盾。

(1)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来看,区别于20世纪干部、工人的简单岗位职业分工,现今我国产业结构深刻变化,第二产业迅猛发展,制造业向中高端方向发展,2019年末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成为社会就业主要方向。新兴产业对劳动者技能有着较高要求且面临较快的技术更新迭代,这与延迟退休产生的劳动力累积容易导致供给和需求不匹配冲突,延迟退休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的更新换代存在一定的拖累效应。同时,延迟退休带来的退休金缴纳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均由企业负担,从市场经济角度不利于企业的经济投入产出。

(2)从人口结构压力来看,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老龄化形势严峻。2021年我国应届大学生毕业人数将会达到909万人,从2001年到201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已累计近亿人。虽然对外公布就业数据为90%以上完成就业,但从近年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考研比例来看,就业依旧是青年群体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延迟退休意在缓解老龄化压力,提

升劳动力使用周期,减轻养老金缺口压力,但在我国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依旧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下,老年群体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存在“顺位挤压”效应,在人口总量和市场规模阶段性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岗位挤压将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3)从行业阶层横向比较来看,由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批国有企业单位改制、合并、破产,大量产业工人经历下岗再就业,后因社会保障政策出现回旋调整,可重新补齐养老保险,享受职工退休待遇,由此牵涉到相当一部分政策敏感人群对于退休金的领取时限。他们早已离开原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二次就业,延迟退休进一步延迟了他们享受退休金待遇的年龄。同时,由于现今国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的管理技术岗位、行政领导岗位的资历待遇随工作经历累积,相较于体能消耗较大的一线劳动岗位,其行业阶层收益差距在延迟退休政策下将会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行业阶层间的社会心理失衡。

3.从劳动者个体角度来看,易出现身体劳损、利益受损、获得感剥夺等问题。

(1)从劳动者个人体质角度看,对于一线劳动者,延迟退休导致其劳动年限的绝对时长增加,尤其是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延长工作年限将对劳动者个体带来身体劳损程度加深的风险。同时,延迟退休因其小步调整的时间累积性对青壮年劳动者产生影响,将直接导致劳动年限的绝对增长。由于人均寿命相较于上世纪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延迟退休年龄会相对挤压个体享受退休养老的时间。

(2)从劳动者社会发展来看,因历史原因,存在部分在岗工资低于退休工资的劳动人群,延迟退休对其有较为普遍的利益损害。同时,由于社会业态的复杂性,自由职业或者个体经营者自行承担养老保险的缴纳义务,延迟退休政策会增加其缴纳的年限和缴纳金额。对于存在闲暇时间偏好或者退休后再就业的劳动者来说,延迟退休对其社会增益并无

显著提升,反而容易出现社会抵触心理。

(3)从劳动者心理获得感来看,不同职业阶层民众受延迟退休的影响不同,容易激化行业阶层之间的失衡心理。同时,我国老年群体对于家庭的回归和隔代照顾效应日益增大,延迟退休无疑会挤占其个体生命安排,出现市场和家庭的个人精力竞争,引起老年群体的多重角色冲突。劳动权利意识在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下,主体权利易于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义务感。

四、延迟退休政策施行的对策建议

随着社会政策从“补缺型”向社会发展型演变,为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延迟退休政策不应仅限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视域,更应作为新时代政策改革发展的先驱标杆,引导社会各界对新时代社会政策形成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发挥社会政策的导向治理作用。

(一)加强引导,通过科学论证和人文情理兼顾推动政策“合法化”过程

1.强化发展型政策意识导向。社会政策作为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形成社会意识的社会治理手段,需要逐渐将其从单一政府行政行为转化为全民共同参与的社会互动载体。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统筹兼顾、分类应对、有序推进,促进公众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正面效应的价值认知。通过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实施,提升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权益的关注程度,以政策推动社会劳动力的结构升级,实现积极的社会效益导向。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形成政府、社会、公民良性互动沟通的有益模式。通过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积极参与、公民主体自觉的全过程合作,促进延迟退休政策的社会合法化共识的早日实现。

2.同步完善政策体系和配套制度。明确主管职能部门权责,建立社会相关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制定实施方案,将整体政策制定实施作

为一项长期化社会工程进行科学设计。加强历史性、区域性、行业阶层的多元考量,充分论证、试点施行,出台一系列政策制度,同时有效调配其相关社会制度,实现整体退休制度的有效有序改革推进。在延迟退休制度颁布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利益相关的预退休人群的政策适用性监测,减少政策对其实际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于历史性的城乡区域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制定配套的老年群体延迟退休、二次就业促进的相关政策,提升政策的现实可行性。

3.关注政策过程性反馈和实时调整。在政策实施之前与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合作,制定政策科学监测方案,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科学监测设计,构建科学监测模型。注重监测对象的代表性,注重不同年龄段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受应效果,同时关注城乡及不同地域间的政策受应差异,确保整体监测的科学性。建立社会政策反馈渠道,建立职能部门、工会、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定期反馈机制,开设电话、互联网等反馈通道,注重社会政策“安全阀”的建立。通过定时观测、全面收集,注重不同地域的政策反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和问题疏导,增进政策的公共参与度和社会反应速度。

(二)增进共识,促进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协同

1.加强社会舆论宣传。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作为覆盖整体社会成员的变革性政策,首先,需要通过科学的社会舆论宣传,获取社会各界的充分认知,建构延迟退休年龄的合理性社会认知。加强政府、企业的社会宣导,开展相关政策培训,提升企事业单位、广大劳动者对该政策社会意义的集体认同。通过网络媒体、新闻矩阵进行细致解读,缓和社会公众对政策变更的潜意识排斥心理。构建发展性社会心态,要充分认识延迟退休政策的长期性效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取向,规避因一时一利的狭隘心理影响整体政策的施行。

2.提升政府作为,以正向激励合作为主。提升政府治理服务能力,提前预判政策执行情况,建立干预应对机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加强与企事业单位和各业态沟通,了解实际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干预方案。建立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政策协同机制,强化政府政策监测职能,促进企业单位对新政策的理解接受,通过减免税收、政策补贴等方式引导企业对于老年劳动力的合理雇佣,营造有序的老年就业市场,改善老年劳动力的待遇保障,促进三方的合作协同推进,避免出现政府一头热、一手推、一刀切的矛盾激化。

3.做好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的长期化工作准备。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我国因人口基数大,社会从业业态多元,保障待遇因地域、行业有多重差异,延迟退休政策在现今多元业态和社会累积的时空交叉现状中,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因地制宜。在政策施行强度上,做好弹性化应对措施,确保企业和劳动者在政策颁布后的问题软着陆。在政策覆盖上,坚持分类推进,注重缩小不同行业阶层在延迟退休年龄后的社会获利差距,秉承社会公平的福利观,缓和行业阶层的利益矛盾,保障企业的集体权益和劳动者的个体获益相统一。

参考文献:

- [1] 贾俊平,等.统计学(第7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2] 丛春霞.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分析[J].中国发展观察,2009(12):20-23.
- [3] 林宝.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模式关系辨析[J].人口与发展,2010(11):17-22.
- [4] Stefan Staubli,Josef Zweimüller.Does Raising the Early Retirement Age Increase Employment of Older Worker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3(12):17-32.
- [5] 潘锦棠.世界男女退休年龄现状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3(1):103-107.
- [6] 林义.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保障配套改革的几个问题[J].经济学家,1995(2):75-80+106.

- [7] 王振军. 我国退休年龄延迟设计研究[J]. 西北人口, 2014, 35(5): 29-34.
- [8] 冯媛. 从同龄退休的争论看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J]. 妇女研究论丛, 2003(6).
- [9] 陈卫民, 李莹. 退休年龄对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性别差异的影响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04(1).
- [10] 杨贞贞, 史文钊, 陈立影, 等. 法定退休年龄延迟对劳动力市场的挤占效应研究[J]. 第一资源, 2010(3): 144-162.
- [11] 阳义南, 谢予昭. 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来自 OCED 国家的经验数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4): 46-56.
- [12] 饶茜, 江文昶, 姜宇. 提高我国养老保险退休年龄的相关研究——财务平衡下对缴费率影响的定量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05(1): 64-70.
- [13] 穆怀中. 老年社会保障负担系数研究[J]. 人口研究, 2001(4): 19-23.
- [14] 柳清瑞, 金刚.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J]. 人口与发展, 2011, 17(04): 39-47+63.
- [15] David A. Wise. Introduction to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16] Franklin A Michello, William F. Ford. The Unemployment Effects of Proposed Changes in Social Security's "Normal Retirement Age" [J]. Business Economics, 2006(4): 38-46.
- [17] Ford M W. The Unemployment Effects of Proposed Changes in Social Security's Normal Retirement Age [J]. Business Economics, 2006, 41(2): 38-46.
- [18] Martins P S, Novo A A, Portugal P. Increasing the Legal Retirement Age: The Impact on Wages, Worker Flows and Firm Performance [J].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9, 6(1): 1-36.
- [19] Magnani R.A. General Equilibrium Evalu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Pension Reforms in Italy [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1, 65(1): 5-35.
- [20] Miyazaki K. The Effects of the Raising the Official Pension Age Policy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Economy [J]. Economics letters, 2014, 123(3): 329-332.
- [21] 林熙, 林义.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者养老金收入的影响——基于 Option Value 模型的预测[J]. 人口与经济, 2015(6): 12-21.
- [22] 王天宇, 邱牧远, 杨澄宇. 延迟退休、就业与福利[J]. 世界经济, 2016(8): 69-93.
- [23] 封进. 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及福利的影响: 基于异质性个体的研究[J]. 社会保障评论, 2017(4): 46-59.

【责任编辑 王东伟】

(上接第 71 页)

参考文献:

- [1] 杨建利, 岳正华.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 1991-2010 年数据的检验[J]. 软科学, 2013(1): 42-46.
- [2] 邹文杰, 冯琳洁. 空间异质性, 收入门槛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J]. 财经论丛, 2015(9): 18-26.
- [3] 魏建, 杨志明, 张广辉.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11): 45-54.
- [4] 李燕凌, 欧阳万福. 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11(10): 110-122.
- [5] 汪海洋, 孟全省, 亓红帅, 等.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72-79.
- [6] 王谦, 李超, 侯建国.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基于 1995-2015 年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6): 104-111.
- [7] Greenwood, Jeremy and Boyan Jovanov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4: 1076-1107.
- [8] Burgess R, Pande R.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 780-795.
- [9] 吕勇斌, 赵培培. 我国金融助农与反贫困绩效: 基于 2003-2010 年的经验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1).
- [10] 张兵, 翁辰. 金融助农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9): 39-49.
- [11] 彭克强. 财政与金融支农整合的理论架构与方略[J]. 社会科学, 2008(12): 46-54.
- [12] 黄寿峰. 财政支农、金融支农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空间面板分位数模型的研究[J]. 财经纵横, 2016(8): 78-90.
- [13] 肖育才, 姜晓萍. 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11): 35-44.
- [14] James LeSage, R. Kelley Pace.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 (M).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 [15] 李婧, 谭清美, 白俊红. 中国区域创新生产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7): 43-55.

【责任编辑 郭艳娇】